

# 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編制

曾秀雲 王浩威

**研究目的：**親密暴力是侵犯人權與心理衛生的重要問題。本研究編製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提供當事人具有信效度的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鼓勵當事人在匿名的處境下，進行多面向的自我評估，了解個人所面臨精神暴力的處境。**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分為四個階段編製量表。前三階段邀請助人工作者進行親密暴力評估，確認量表題項。第四階段，邀請180位受害當事人填寫問卷(37位男性，平均38.56歲；143位女性，平均35.79歲)，並驗證量表的信效度與適配度。**研究結果：**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分為「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四個構面，具有信度與效度，且提供良好的適配度。多群組分析進一步驗證本量表具有性別恆等性。ROC曲線分析驗證本量表具有良好的篩檢力，並提供適切的評估。**研究結論：**本研究區分出「高風險」與「低風險」確實可以反映精神暴力嚴重程度的高低，亦幫助當事人自我評估精神暴力的危險程度。

**關鍵詞：**心理/情緒虐待、高壓管控、精神暴力、親密暴力

---

曾秀雲：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線上測驗編制、家庭與性別相關議題。(通訊作者；E-mail: shelley.tw@gmail.com)

王浩威：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副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精神分析、榮格心理分析、身心醫學、青少年心理治療、男性心理治療。

收稿：2022年9月20日；接受：2023年1月24日

## 一、緒 論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將親密暴力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定義為「親密伴侶或前伴侶的行為導致身體、性或心理傷害，包括身體侵犯、強迫性行為、心理虐待和控制行為」，是女性受傷常見原因之一，也是侵犯人權與心理衛生的重要問題，有礙於被害人的身心發展 (Campbell, 2002; WHO, 2021)，其中以高壓管控 (coercive control) 易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情緒 / 語言和支配 / 孤立的暴力形式與憂鬱症有顯著關聯 (Dokkedahl et al., 2022)。

精神暴力先於肢體暴力，且不以單一事件為特徵，而是隱微、反覆和長期的影響當事人 (Dokkedahl et al., 2022; Frieze, 2005)。WHO 家庭暴力和婦女健康多國研究 (multi-country study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women's health, 簡稱 MCS) 注意到 IPV 精神暴力的問題，2000 年開始展開調查 (Heise et al., 2019)。根據 WHO 將 IPV 區分為肢體暴力、心理 / 情緒虐待、性暴力、控制行為等四種類型，其中心理 / 情緒虐待與控制行為（又稱為「高壓管控」，例如：與家人 / 朋友隔離，監控行動，限制獲得信息和服務，以及不允許外出工作）屬精神暴力的範疇，不但盛行率高，且與肢體暴力和性暴力有高度的關聯性 (Campbell, 2002; Carney, & Barner, 2012; Heise et al., 2019; WHO, 2021)。歐洲性別平等研究所 (European institute of gender equality, EIGE) 亦指出雖然歐盟會員國對於 IPV 的定義不盡相同，但 28 個國家中有 25 個將精神暴力涵蓋在 IPV 中，並有會員國單獨將精神暴力列為刑事犯罪 (EIGE, 2017)。

臺灣 IPV 界定主要以《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為基準，強調「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包含：肢體、精神與經濟暴力，其中精神暴力係指精神上的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包含心理 / 情感虐待、跟蹤或強迫行為等（不含經濟暴力），涉及高壓管控的範疇 (Carney & Barner, 2012; Stark, 2007)。根據潘淑滿等 (2021) 調查指出，我國 18-74 歲婦女遭受 IPV 以「精神暴力」為主，如 Follingstad 等 (2005) 所言精神暴力涵蓋多重構面，若評估工具鑲嵌於 IPV 調查之內，測量構面易過度化約，加上華人「家醜不可外揚」與「床頭吵，床尾和」的傳統觀念，為保全個人面子與家族和諧，精神暴力易被忽

視或掩蓋，甚至出現「暴力合理化」的現象（戴世玫，2016），實需發展本土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

對此，研究者檢閱國內相關評估工具的討論，以林明傑等（2003）編修 Straus 等（1996）修正衝突行為量表（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CTS-2）最為常見，但該量表須經當事人報案後由警員協助進行自我評估，匿名性偏低。王珮玲（2012）在實務工作中建構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有關精神暴力的評估主要聚焦暴力致命風險的判斷。而沈瓊桃（2013）與沈瓊桃等（2019）是少數注意到精神暴力多面向的研究，但可惜後續未進行延伸與討論，其量表設計亦以學術研究為目的，未提供自我評估的辨識依據。至於衛福部（2021）公布簡易精神暴力自我檢測量表，雖強調實務工作為目的，提供計分方式，匿名性高，可推及一般社會大眾，但缺乏多面向評估與檢驗證據，辨識依據亦過於直覺與粗略。

對此，本研究編制精神暴力的自我評估量表欲兼具學術與實務目的。一方面，提供當事人具有信效度的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二方面，鼓勵當事人可在匿名的處境下，進行自我評估；三方面，提供當事人對於精神暴力危險程度，進行多面向的風險評估，有助於精神暴力分級分類，辨識個人所面臨精神暴力的處境。

## （一）精神暴力的盛行率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開展全國親密伴侶和性暴力調查（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NISVS），將精神暴力界定在透過表達攻擊與高壓管控，羞辱、辱罵、監視、威脅、控制伴侶的行為，並於 2017 年公布 2010-2012 年數據，47.1% 女性與 47.3% 男性在一生中受到親密伴侶的精神暴力，各州佔的比例女性盛行率在 36.6% 至 57.2% 之間，男性在 29.3% 至 56.2% 之間，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Smith et al., 2017）。歐盟基本權利署（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EUAFR, 2014）將精神暴力界定在控制行為（孤立與限制對方行動）、經濟暴力、辱罵與虐待行為（貶低、羞辱、威脅與恐嚇）與其他形式心理虐待，並調查歐盟 28 個國家 42,000 名 18-74 歲女性，指出有 43% 女性經歷過親密伴侶某種形式的精神暴力，其中 35% 女性經歷伴侶的控制行為。另有 18% 女性有被跟蹤的經驗，有 5% 女性在過去一年內曾經被跟蹤過。

國內相關調查多以學者承接政府計畫案為主。例如：王麗容等(2012)將精神暴力界定為怒罵、控制、禁止、限制、威脅、強迫伴侶的不當行為，根據性別暴力電訪問卷調查結果指出，我國男性精神暴力終生盛行率3.66%，女性終生盛行率5.24%，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至於年齡分布上，36-50歲盛行率5.71%最高，其次51-65歲(含以上)為4.68%，16-35歲2.96%為最低。潘淑滿等(2015)對於精神暴力的界定則包含情緒暴力、謾罵、精神虐待、剝奪生存基本權、威嚇、忽視、控制等，使受害人心生恐懼，並針對我國18歲以上女性進行調查發現，在過去一年內遭受IPV的盛行率分為10.3%。IPV樣態以遭受精神暴力(21.0%)為主。潘淑滿等(2021)指出在聯合國與WHO使用相同的測量題項，我國女性在過去一年中精神暴力之盛行率是6.15%，終生盛行率是15.23%，兩者計算出的盛行率略高於歐盟指標(4.95%與13.01%)，可見使用指標不同，盛行率的估計也有極大的差異。至於沈瓊桃(2013)主要針對大專生約會暴力調查發現，精神暴力男性受害的盛行率為57.0%，女性為54.2%，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但其盛行率計算明顯高於其他學者對於一般成年人精神暴力盛行率的估計。

綜觀上述，精神暴力涵蓋的面向非常廣泛(包含：語言貶抑、威脅恐嚇與行為控制)，甚至部分研究將經濟暴力視為精神暴力的一環；因此，不同調查機構對精神暴力盛行率估計差異甚大，尤其在父系傳承「家醜不可外揚」規範下，精神暴力顯得更為隱微，由外而內將暴力行為合理化(戴世玫，2016)。此外，在調查評估對象上，不少研究只聚焦於女性曾經遭受現任或前任伴侶的暴力經驗，忽略許多IPV是雙向發生的(Hamberger, 2005)。近年來陸續雖然有研究注意到男女遭精神暴力的盛行率沒有明顯差異，並針對男性受暴現象進行調查訪問，認為男性受暴有違男子氣概的展現，不易被述說，尋求幫助的比例遠低於女性，容易被忽略(Corbally, 2015; Douglas & Hines, 2011)，但可惜國內對於IPV圖像與評估工具的驗證仍多以女性為受暴主體(王珮玲，2012；戴世玫，2016)。

## (二)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的測量

### 1. 精神暴力的定義

1970 年代開始有學者從女性主義角度注意 IPV 的問題，又以精神暴力比肢體暴力更具破壞與傷害性 (Walker, 1979)。早期精神暴力的界定主要聚焦於非身體形式的虐待與傷害，用來區辨肢體暴力帶來的致命風險 (Shepard & Campbell, 1992)。Straus 等 (1996) 進一步注意到伴侶衝突中語言和非語言行為對伴侶造成的威脅與傷害，並將精神暴力與性暴力區分開來。Jacobson 與 Gottman (1998) 及 Tolman (1999) 著重於非身體的虐待，將精神暴力界定為成人親密關係的心理 / 情緒虐待，視其為綜合型的暴力形式，涵蓋多重形式的行為樣貌，並著重於男性對女性伴侶的控制評估。

2000 年以後，有越來越多研究注意到精神暴力的多樣性與雙向性，受暴對象不僅只有女性 (Follingstad, 2007; Hamberger, 2005; McHugh et al., 2013)。此外，Dutton 與 Goodman (2005) 提出 IPV 高壓強制模式 (model of coercion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強調高壓強制包含了要求對方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控制機制，若不遵從將威脅造成負向的後果。Stark (2007) 進一步強調高壓強制 (coercion) 是指使用武力或威脅來強迫或消除特定反應，控制 (control) 是指透過剝奪、剝削和命令的結構形式，間接強迫對方服從，而高壓強制和控制同時發生的「高壓管控」是一種限制與不自由的狀態，暴力相對人具有完全的支配權力，透過威脅來支配、掌控對方的日常生活，而當事人則喪失自主性。Stark (2013) 進一步指出高壓管控是最具破壞性的伴侶虐待，因為它結合恐嚇、貶低、孤立和控制當事人，使對方因結構性依賴、孤立和控制而無法有效抵抗或逃避虐待，是一種策略性的壓迫過程。對此，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將「高壓管控」視為精神暴力的一環，並納入家庭暴力法規（如 2010 年法國，2013 年英國，2019 年愛爾蘭），保護隱形的受害者。WHO 也回應高壓管控隱性暴力的觀察，考慮了心理暴力 / 情緒虐待不等同於控制行為，並將兩個概念做了明顯的區分，其中心理暴力 / 情緒虐待強調侮辱、貶低、持續羞辱、恐嚇（破壞物品）、傷害威脅、威脅帶走兒童；而控制行為包含孤立、監視、忽視、控制伴侶，強調與家人和朋友隔離開來，監控與限制他們的行動 (WHO, 2021)。EIGE 進一步從傷害的角度定義精神暴力，強調以脅迫、誹謗、言語侮辱或騷擾等形式，藉由貶低、羞辱或破



壞對方的自我價值感與自尊，或故意脅迫或威脅嚴重損害對方心理健康，造成心理傷害 (Dokkedahl et al., 2022; EIGE, 2017)。整體而言，可以看出近年來對於精神暴力的界定，涵蓋的範圍包含語言與非語言的心理 / 情緒虐待，以及嚴格的支配與控制行為。

## 2. 國外自我評估工具的發展經驗

從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的發展來看，精神暴力一開始僅被視為 IPV 其中一個測量維度，其評估工具多鑲嵌於 IPV 當中。例如：虐待行為檢測 (abusive behavior inventory, ABI) 檢視精神暴力與肢體暴力的差異 (Shepard & Campbell, 1992)；Straus 等 (1996) 修訂 1979 年編制 CTS，包含：協商談判、心理攻擊、身體攻擊、性暴力與傷害五個構面。1990 年代末期才有學者從多維度觀點編制精神暴力量表，例如：Jacobson 與 Gottman (1998) 將情緒虐待問卷 (emotional abuse questionnaire) 區分隔離、貶抑、性虐待及財產損失四個構面，其中隔離以限制自由的方式，導致當事人有孤獨的感受，而貶抑則以公開侮辱為最常見的暴力方式。Murphy 與 Hoover (1999) 將情緒虐待區分為敵意撤離、支配恐嚇、詆毀、限制行動 (restrictive engulfment)。Tolman (1999) 編修短版女性心理虐待量表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of women inventory, PMWI)，測量女性受到男性伴侶的心理虐待程度，其中精神暴力可區分支配 / 孤立 (如：我的伴侶限制我使用電話) 和情緒 / 語言 (如：我的伴侶把他的問題歸咎於我) 二個構面。

2000 年以後，有學者認為「心理虐待」涵蓋精神暴力，並隱含性別角色的文化腳本與權力結構的不平等，以及特定意識形態與權力支配關係 (Dutton & Goodman, 2005; Follingstad, 2007; Stark, 2007)。WHO MCS 對於精神暴力的測量包含了心理 / 情緒虐待與控制行為，其中心理 / 情緒虐待的題項涉及語言羞辱、貶抑，以及恐嚇與威脅；行為控制的題項涉及高壓管控的監視、隔離、孤立與控制 (Heise et al., 2019; WHO, 2021)。NISVS 測量 IPV 跟蹤與心理暴力 (表達攻擊與高壓管控) 屬精神暴力的範疇，而表達攻擊涉及語言暴力，高壓管控涉及監視、控制或威脅當事人 (Smith et al., 2017)。EUAFR (2014) 對於精神暴力的界定包含控制、辱罵與虐待行為、經濟控制，以及利用子女進行勒索。其中控制行為係指試圖阻止當事人見她的

朋友或探望她的家人，堅持要知道她在哪裡；辱罵與虐待行為係指用口語當眾或私下貶低或羞辱當事人，不讓她離開家或將她關起來，故意恐嚇或威脅她。跟蹤看似個別無害的行為，亦破壞當事人的安全感，測量的內涵包含攻擊或威脅性通信、跟蹤或遊蕩，以及財產損失。

近年來，陸續有學者注意到精神暴力自評工具性別與年齡差異，以及多群組恆等性的問題。例如：Martín-Fernández 等(2019)進一步檢視 EUAFR 提供的數據發現，精神暴力可簡化為情感虐待（含貶低、羞辱等情感傷害或威脅行為）和控制行為（含監視、限制與經濟控制）兩個構面（或合併為同一構面），提供證據證明 EUAFR 精神暴力的測量工具有跨國恆等性，但可惜調查樣本均以女性為受害主體，未能進一步提供性別恆等性的證據。Wareham 等(2022)檢視 CTS-2 性別恆等性發現，多項指標違反性別恆等性的假設，意味著該測量工具本身存有性別的偏見，不適合進行跨性別的比較。Karakurt 與 Silver(2013)研究則注意到世代的差異，並指出年輕人遭到精神暴力的機率比年長者高，且隨著性別角色和資源分配的變化，以年輕男性遭到精神暴力的現象最為嚴重。

綜觀上述，(1) 精神暴力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並不適用單一維度的評估，宜從多重構面進行測量。(2) 經濟暴力與性暴力雖有部分學者納入精神暴力的範疇，但研究者認為經濟暴力與性暴力概念涉及不同範疇，應分開討論。(3) 過去調查多以女性為主(McHugh et al., 2013；王珮玲，2012；潘淑滿等，2015，2021)，相關自評工具亦缺乏性別與年齡恆等性檢測，且缺乏測驗分數與切點的討論。

### 3. 國內自我評估工具的發展經驗

國內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的測量早期以林明傑等(2003)編修 CTS-2 的心理攻擊(psychological aggression)為主，命名為「修正 CTS 量表精神虐待」，該量表由警員或社工協助當事人進行評估，推行多年，且運用性很廣泛。相關題項涉及語言暴力、威脅攻擊、性暴力與控制，該自評工具有切點區分輕度、中度與重度暴力風險，應用性雖高，但由於該量表已使用超過 15 年，一方面，內容未涉及孤立隔離、跟蹤監控與騷擾，以及情感勒索與控制的相關題項；二方面，忽略新的暴力型態與報案填答當事人的匿名效果；三方面，工具評估未納入男性樣本，實須發展新的測量工

具，並進行性別與年齡恆等性檢測。近年來，伴隨著家庭暴力危險分級分類的討論，2011 年推行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聚焦於高致命危險案件的評估與快速篩檢（林明傑、吳啟安，2018）。王珮玲（2012）亦配合國家政策，發展我國親密關係暴力致命危險評估工具 TIPVDA，應用於當事人報案時，工作人員協助當事人的自我評估工具。TIPVDA 雖然有關精神暴力題項，並以 ROC 曲線分析進行致命風險判斷，但對於精神暴力型態缺乏多重構面的考量，不宜社區樣本自行單獨使用；此外，TIPVDA 量表建構與驗證僅以女性受暴者為研究對象，忽略男性樣本，無法進行性別恆等性驗證。

礙於過去在實務運用上，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主要以第一線助人工作人員（如警員、社工或醫護人員）協助當事人進行自我評估，且多著重於致命風險，忽略隱微、長期使人心生畏懼的精神痛苦，亦未納入男性受暴經驗。相較之下，姚淑文（2017）發展的校園約會暴力自我檢視表雖較適用於不同性別的受暴經驗，但其精神暴力聚焦於對方具體的侵害動作或行為，較少當事人心生畏懼的感受，涵蓋內容攻擊威脅、語言暴力、支配隔離、跟蹤監控與騷擾，缺乏孤立社交圈、以及情感勒索與控制的相關題項，對於暴力風險高低的評估仍由學校輔導老師進行引導，缺乏自我評估的切點估計。沈瓊桃（2013）則表示，大專生不分男女，其精神暴力盛行率前三名皆為「對方辱罵我」、「對方對我大吼大叫」、「對方嘲笑貶抑我」，雖均屬於言語暴力，但精神暴力可分為「言語暴力」、「跟蹤控制」、「破壞毀損」、「自傷威脅」及「使人心生畏怖」5 個構面，其中「自傷威脅」引發當事人的內疚感作為心理控制的手段，不同於國外精神暴力的測量內涵，可惜文章沒有多做討論；此外，該量表著重於學術層面觀察，雖收集不同性別的樣本資料，並由當事人以匿名方式進行多面向的自我評估，但未呈現精神暴力性別差異的比較結果，亦未提供實務運用的切點辨識，實為可惜。

整體而言，國內精神暴力評估工具的發展經驗與國外相似，評估對象從女性受暴經驗開始，逐漸注意到男性受暴問題，並在實務工作中設立男性關懷專線，但相關研究仍略為不足。評估工具多鑲嵌於 IPV 當中，在內涵上雖汲取國外發展經驗的優點，並考量本土化經驗而有不同的著重點，但可惜在實務運用上多以受理案件為



主，經由助人工作者（如學校老師、警員、社工、心理師或醫護人員）協助當事人進行自我評估，而非當事人自行評估，匿名性偏低。雖然潘淑滿系列研究重於全國性調查，注意到社區樣本的重要性，但似乎多從執政者視角，關注女性受暴現象、盛行率的預測，以及為國際接軌比較國際測量指標（潘淑滿等，2015；潘淑滿等，2021），忽略測量工具恆等性檢驗與切點評估。國內唯一在實務上提供社區樣本，量表附有切點參考，僅有衛福部（2021）公布 6 題簡易精神暴力自我檢測量表，涵蓋的內容包括語言暴力、跟蹤騷擾、攻擊威脅、情感控制與冷暴力。可惜該量表題項過於精簡，一方面，忽略了剝奪、規範、限制、隔離、孤立等，限制伴侶行動自由與孤立社交活動等支配隔離的高壓管控；二方面，計分切點強調 6 題項指標只要曾經出現過任何一項，即有精神暴力的可能，評估過於粗略，缺乏客觀的評鑑依據。

誠如上述，研究者認為編制具有本土化內涵，匿名性較高，且具有信效度的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應（1）考量精神暴力有多重構面，例如：採取語言與非語言的方式進行，涉及情緒與行為，或是心理與行為控制。（2）考量不同國家的文化脈絡，發展不同國家的計分標準與計算分數的切點，區分高分組和低分組，如 Johnson(2008) 所說的，並非所有的支配控制或威脅都是高壓管控，也可能只是伴侶衝突的延伸反應，須根據不同的互動脈絡與控制程度有不同的評估。（3）關注自我評估工具性別與年齡恆等性檢定，避免測量工具本身隱含性別偏見。（4）提供社區樣本的測量題項明確的切點，以利一般民眾可以直接進行檢測，並有助於了解暴力的樣態，釐清個人精神暴力的風險高低。

## 二、研究方法

###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共分為四個階段編製「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在第一階段，研究者於 2022 年 2 月首先針對 18 位助人工作者進行認知訪談，編修量表。2022 年 3 月邀請 2 位對 IPV 兼具實務與研究專長的博士進行專家效度，檢視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的預試測量題項是否周延與適切，並針對有疑慮的題項內容提出修改建議。根據

審題結果，共修編「他羞辱我的外表與能力，讓我覺得『自己沒有用』或『沒人要』等」、「他會對我大吼大叫」、「即便倍感壓力，我仍得要隨時跟他報告行蹤」與「他為了羞辱我，詆毀我親友的聲譽」四個題項陳述，最後確定預試內容與題數（共為 20 題）。第二階段，2022 年 4 月研究者邀請助人工作者進行評估，預試調查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致性信度結果，進行量表的題項挑選。第三階段，2022 年 5 月底前研究者持續進行助人工作者評估，並以統計軟體 AMOS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助人工作者對「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評估的信度與效度。第四階段，2022 年 6-7 月研究者主要針對 IPV 倖存者進行調查。

此外，為了更進一步瞭解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本研究以「修正 CTS 量表精神虐待」量表與當事人危險程度的自我評估為外部效標，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檢視「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各構面與外部效標之間的關聯性，並利用多群組分析 (multi group analysis) 進行性別恆等性檢驗。最後，本研究以 ROC 曲線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評估兩分變項的預測表現，計算 ROC 曲線下之區域面積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評估預測準度 (Rice & Harris, 1995)，以及 Youden 指數討論量表分數的切點，並檢視外部效標在各構面分數的差異。

##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前三階段主要針對助人工作者進行調查與評估。其中第一階段研究對象，主要針對 18 位助人工作者進行認知訪談。訪談對象包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教師、諮商研究所的學生等，其中 5 位男性，13 位女性（詳見表 1）。為求研究嚴謹性，進一步邀請 2 位博士級專家進行專家效度，針對問卷內容進行審題。第二階段預試調查助人工作者對 IPV 評估，研究對象年齡為 20-65 歲（包含：社會工作、心理諮商輔導與臨床工作、教育與醫療工作人員等），透過 Facebook、Line 與助人工作的網路社交平台，進行網路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 455 份。其中 104 位男性，平均 33.59 歲；351 位女性，平均 34.77 歲。第三階段，正式調查驗證助人工作者對「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評估；故研究者延續預試調查抽樣與調查方法，共回收有效問卷 670 份。其中 131 位男性，平均 34.79 歲；539 位女性，平均 35.68 歲。

第四階段，本研究將調查對象改為 20-65 歲曾與危險情人交往的當事人，若遭到伴侶施暴一次(或一次以上)視為有 IPV 經驗；若所有題項都「從來沒有」IPV 經驗，或危險程度自我評估為 0 分，均不納入分析。本研究邀請助人工作者代為邀請 IPV 倖存者填寫問卷，以滾雪球抽樣進行網路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80 份。其中 37 位男性，平均 38.56 歲；143 位女性，平均 35.79 歲。

表 1 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表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29歲	1	8	34	101	38	165	4	40
30-39歲	3	3	53	168	61	202	19	60
40-49歲	1	2	12	58	19	115	9	35
50歲以上	0	0	5	24	13	57	5	8
合計	5	13	104	351	131	539	37	143

###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國內常使用的「修正 CTS 量表精神虐待」量表與當事人危險程度的自我評估為外部效標。其中「修正 CTS 量表精神虐待」量表主要針對 CTS-2 心理攻擊的部分進行量表編修，並經由訪談社工計算加權分數(林明傑等，2003)。測量發生頻率，0 表示從來沒有過，1 表示 1 次，2 表示 2 次，3 表示 3-5 次，4 表示 6-10 次，5 表示 11-20 次，6 表示 20 次以上，分數越高，表示發生頻率越高，共計 9 題。

而當事人危險程度的自我評估則受到國內實務工作者肯定(王珮玲，2009)。本研究為理解當事人自我評估的危險程度，採用諮商技巧中的尺度技術(scaling)，邀請當事人填寫尺度問題，「如果危險程度 0 至 10 分，請問您評估這段關係的危險程度是幾分？」進行危險程度的評分。

### 三、研究結果

#### (一)「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的內涵

鑒於 2022 年 6 月開始實施《跟蹤騷擾防制法》，本研究精神暴力係指「相對人藉由語言攻擊或非語言暴力的行為，使之心生畏懼」，涉及語言與非語言的心理 / 情緒虐待，以及嚴格的支配與控制行為，內涵包含：貶抑、辱罵、威脅、恐嚇、跟蹤、監視、控制、孤立等，但不含忽視冷漠、無視伴侶存在或拒絕交談等冷暴力形式。在自我評估量表的題項設計，區分語言與非語言暴力。戴世玫 (2016) 研究曾指出，臺灣暴力形式以精神暴力為主，常見以語言暴力罵髒話的方式貶抑對方，即語言暴力主要利用羞辱、貶抑性的談話、言詞、語調來施行暴力，進而延伸威脅與恐嚇，不同於單純的語言貶抑，雖然沒有其他支配的具體行動，但也可能涉及態度與高壓控制，故研究者認為語言攻擊與威脅不同於「語言貶抑」。而非語言暴力則是透行為、態度或高壓控制的方式來施行暴力，包括：「攻擊威脅」、「支配隔離」及「跟蹤控制」。「情緒威脅」如沈瓊桃 (2013) 提出「自傷威脅」，引發當事人的內疚感作為心理控制的手段，以支配對方。

研究者參考國內外對於心理、情緒、語言暴力，以及控制行為、高壓管控等精神暴力評估的內涵進行歸納整理，如表 2 所示，研究者根據各構面內涵與概念化定義編修適合的題項，針對 18 位助人工作者，進行認知訪談後，邀請 2 位 IPV 實務與研究專長的博士進行專家效度審題，最後完成 20 題預試題項。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四個構面 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分別為 .810、.730、.871、.794，皆為 .70 以上，表示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四個構面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 (二)第二階段預試調查結果

第二階段預試調查助人工作者的評估結果，以主軸因子法進行 EFA，「隔離支配」與「跟蹤監視」合併為同一構面，研究者刪除無構面歸屬及因素負荷量較低 ( $\lambda$  值小於 .40) 的題項，命名為「控制隔離」，與王佩玲 (2015) 的訪談經驗一致，相

表 2 「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各構面內涵與概念化定義

構面	內涵	題數	概念化定義
語言貶抑	侮辱、毀謗、貶抑、詆毀、辱罵	4	伴侶透過語言公開羞辱我，使我感到自卑與無價值。
攻擊威脅	攻擊性評論、威脅、恐嚇、破壞損毀	5	伴侶透過恐嚇、威脅、攻擊的語言與行動，使我心生畏懼。
支配隔離	剝奪、規範、限制、隔離、孤立、支配、控制	6	伴侶透過剝奪、支配與控制我的行動自由，以及限制社交活動。
情緒威脅	情感勒索、自傷威脅	3	伴侶透過情緒的操弄支配，使我感到內疚或畏懼。
跟蹤監視	跟蹤、監視	2	伴侶跟蹤、監視我的行動。

對人跟蹤監視主要目的即是延伸其支配與控制。研究結果如表 3 所示，「他／她威脅要傷害我在乎的人、事、物」語言表達層面的攻擊與威脅確實不同於貶抑與羞辱性的語言暴力，並與非語言表達形式的攻擊威脅屬同一構面，命名為「攻擊威脅」，異於「語言貶抑」與「控制隔離」；是故，本研究「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抽取「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4 個因素構面，共計有 15 題，整體可解釋總變異量 58.877%，可知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因素效度。

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四個構面 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分別為 .810、.730、.871、.794，皆為 .70 以上，表示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四個構面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 (三) 第三階段正式調查結果分析

第三階段正式調查驗證助人工作者對「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評估結果，確認「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四個構面斜交模式之適配度（詳見圖 1），並確認量表的信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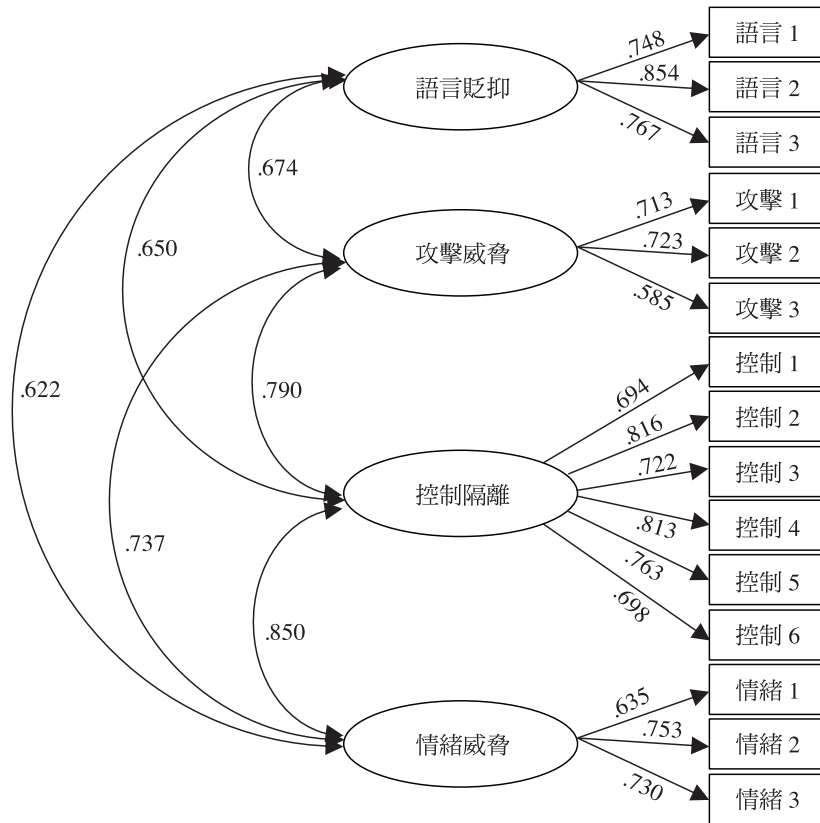


表 3 「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因素分析

	控制 隔離	語言 貶抑	情緒 威脅	攻擊 威脅
1.他/她羞辱我的外表與能力，讓我覺得「自己沒 有用」或「沒人要」等。		.637		
2.他/她在別人面前辱罵我，讓我覺得自己很糟。		.776		
3.他/她到處說我壞話，讓人覺得我有問題。		.549		
4.他/她會透過信件、網路散播傷害或攻擊我的言論。				.613
5.他/她故意做一些事情或動作，讓我感到害怕。				.456
6.他/她威脅要傷害我在乎的人、事、物。				.650
7.他/她以「為你好」為理由，阻止我和身邊的親 友來往。	.625			
8.他/她緊迫盯人，限制或約束我的行動。	.663			
9.他/她不時查看我的手機訊息(電話、簡訊、 LINE、FB…等)或電子郵件。	.662			
10.即便倍感壓力，我仍得要隨時跟他/她報告行 蹤。	.672			
11. 他/她孤立我的社交圈，不許我獨自外出。	.640			
12. 他/她反覆打電話、傳手機訊息(簡訊、LINE、 FB…等)、電子郵件騷擾或威脅我。	.514			
13. 我很害怕他/她會做傷害我的事。			.645	
14. 我常在想「這樣做會不會惹他/她生氣」。			.736	
15. 他/她會用傷害自己的方式，讓我感到內疚。			.592	
變異數%	20.571	13.905	12.957	11.443
變異數累積%	20.571	34.476	47.433	58.877
Cronbach's $\alpha$	.871	.810	.794	.730

註：本表不呈現因素負荷量 $\lambda$ 值低於 .4以下數值。

圖 1 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四個構面斜交模式



### 1. 模式整體適配度之檢定

助人工作者對「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模式整體適配度之檢定參照 Bentler(1990)的建議，(1)卡方自由度比率值 ( $\chi^2/df$ ) 4.763 (小於 5，但大於 3) 為可接受的標準 (Schumacker & Lomax, 2004)，其中卡方考驗值 ( $\chi^2$ ) 需未達顯著水準，但也有學者認為只要樣本數超過 200， $\chi^2$  很容易達顯著，宜放寬標準，並佐以其他指標分數來進行判斷。(2) 適配度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為 .924，比較適配度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為 .937，Tucker-Lewis 適配度指標 (Tucker Lewis Index, TLI) 為 .921，各指標皆大於 .90 達到理想的標準，至於調整後的適配度指標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為 .891，可能受到樣本與參數多寡而被低估，MacCallum 與 Hong(1997) 建議將鑑定標準放寬到 .80，仍可視為可接受的範圍。(3)

平均概似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為 .075 小於 .08，達到良好適配的門檻。整體結果顯示，一階四因素斜交模式具有不錯的適配度。

## 2. 模式違犯估計(offending estimates)之檢視

結構方程模式的違犯估計本研究檢視標準，根據表 4 顯示，「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的誤差變異數皆為正值 (皆大於 0)，標準化係因素負荷係數介於 .585 至 .854 (未大於 .95)，標準誤 .045 至 .142，並無過大之情形；因此，本量表沒有發生違犯估計之現象。

表 4 參數估計值摘要表

構面	指標	模式參數估計值				聚合效度			
		非標準化 因素負荷	標準誤	t-value	p	標準化 因素負荷	SMC	CR	AVE
語言貶抑	語言1	1.000				.748	.559		
	語言2	.968	.049	19.874	***	.854	.730	.833	.626
	語言3	.884	.049	17.893	***	.767	.589		
攻擊威脅	攻擊1	1.000				.713	.509		
	攻擊2	1.361	.088	15.422	***	.723	.523	.715	.458
	攻擊3	.629	.048	13.041	***	.585	.343		
控制隔離	控制1	1.000				.694	.481		
	控制2	1.065	.055	19.362	***	.816	.666		
	控制3	1.212	.071	17.146	***	.722	.522	.886	.567
	控制4	1.319	.069	19.132	***	.813	.662		
	控制5	.825	.045	18.265	***	.763	.583		
	控制6	.871	.052	16.618	***	.698	.487		
情緒威脅	情緒1	1.000				.635	.403		
	情緒2	2.100	.142	14.833	***	.753	.567	.750	.501
	情緒3	1.680	.114	14.785	***	.730	.533		

註：\*\*\*表示 $p < .001$ 。

### 3. 聚合效度檢定(convergent validity)

本研究根據 Hair 等 (2009) 的建議，採用 3 項指標檢視相同構面的個別觀察變項是否會落在共同因素結構上，根據表 4 顯示：(1)「語言貶抑」中 3 個觀察變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係數介於 .748 至 .854，「攻擊威脅」中 3 個觀察變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係數介於 .585 至 .723，「控制隔離」中 6 個觀察變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係數介於 .694 至 .816，「情緒威脅」中 3 個觀察變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係數介於 .635 至 .753，皆大於 .50，且  $t$  檢定皆達顯著，表示觀察變項可以反映潛在變項。(2)「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的組合信度 (construct/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分別為 .833、.715、.886、.750，皆大於 .60。(3)「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分別為 .626、.458、.567、.501，唯「攻擊威脅」AVE 值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36 至 .50)，其他 3 個潛在變項皆大於 .5 以上。整體而言，「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符合聚合效度檢定標準。

### 4. 區別效度檢定

本研究「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構面間 Pearson's 相關係數介於 .514 至 .711 之間，雖然「控制隔離」與「情緒威脅」關聯性略高，但 Pearson's 相關係數小於 .85，顯示潛在變項間沒有高度相關，仍可被視為具有區別效度 (黃芳銘，2003)。

### 5. 信度檢定

本研究信度檢定分別從個別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 CR 來進行驗證，根據表 3 顯示，「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的變異比率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 SMC) 分別為 .559 至 .730、.343 至 .523、.481 至 .666、.403 至 .567 之間，皆大於 .20，符合標準。CR 值介於 .715 至 .886 之間，皆大於 .60。整體而言，顯示「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四個構面具有良好的信度。

#### (四) 第四階段量表切點結果分析

第四階段，以 IPV 倖存者為樣本，考量評估對象為社區樣本，在計分上以簡單、易懂為原則，如王珮玲(2012)編制 TIPVDA 的建議，不採加權計分之方式，直接加總計算各構面暴力發生頻率的總分，進而驗證「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整體適配度，研究結果顯示  $\chi^2/df = 2.080$  小於 3 ( $p = .125 > .05$ )，GFI = .989、AGFI = .944、CFI = .990、TLI = .969 皆大於 .90，達到理想的標準，RMSEA = .078 小於 .08，達到良好適配的門檻。「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CR 為 .80，AVE 為 .502，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並隨後採關聯效度與性別恆等性檢定。

##### 1. 效標關聯效度

本研究外部效標修正 CTS 量表精神虐待與「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情緒威脅」，及精神暴力自我評估的總分相關係數介於 .577 至 .786 之間，皆達中度正相關（詳見表 5）。外部效標當事人危險程度的自我評估與各構面的相關係數介於 .275 至 .466 之間，即精神暴力自我評估的分數越高，當事人評估這段關係的危險程度越高，特別是出現威脅感受時，其危險程度自我評估會越高。

表 5 外部效標與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各構面的相關分析

	語言貶抑	攻擊威脅	控制隔離	情緒威脅	總分
修正CTS量表					
精神虐待	.626***	.577***	.669***	.599***	.786***
危險程度自我評估	.275***	.466***	.310***	.409***	.437***

註：\*\*\*表示  $p < .001$ 。

##### 2. 性別與年齡之恆等性檢定

首先，研究者將男生與女生樣本放在相同的理論模式，檢定各項指標適配度指標皆符合標準，例如： $\chi^2/df = 1.028$ ，GFI = .989、AGFI = .944、CFI = .999、TLI = .998，與 RMSEA = .013，意味著相同一個理論模式適用於不同性別樣本。

其次，測量模式的衡量指標選定採卡方差異量 ( $\Delta\chi^2$ ) 未達顯著 ( $p < .05$ ) 與  $\Delta CFI$  小於 .01(Cheung & Rensvold, 2002) 作為恆等性的指標。結果顯示，因素負荷量、測



量截距、因素變異數與測量殘差的  $\Delta\chi^2$  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 $p = .289 - .708$ )， $\Delta CFI$  亦小於 .01，雖然研究樣本以女性佔大多數，但「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測量模式仍具有性別恆等性。至於在結構模式恆等性檢定中，結構模式亦符合  $\Delta\chi^2$  研究恆等性建議值 ( $p = .893$ )。據此，本研究視「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具有性別恆等性。故，進一步採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性別差異發現，「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四個構面與精神暴力總分，皆無明顯的性別差異。

至於年齡恆等性檢定的部分，研究者參考 Karakurt 與 Silver(2013)的分類方式，以暴力發生的年齡區分年輕(34 歲以下)與熟齡(35 歲以上)兩組放在相同的理論模式，各項指標適配度指標大致符合標準，例如： $\chi^2/df = 2.175$ ， $GFI = .979$ 、 $AGFI = .893$ 、 $CFI = .978$  與  $TLI = .935$ ， $RMSEA = .081$  為可接受的範圍，意味著相同一個理論模式適用於不同年齡組。至於測量模式的檢定結果因素負荷量、因素變異數與測量殘差的  $\Delta\chi^2$  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 $p = .154 - .867$ )， $\Delta CFI$  亦小於 .01，至於測量截距  $\Delta\chi^2$  雖達統計顯著水準 ( $p = .01$ )，但  $\Delta CFI$  小於 .01，符合被接受的範圍。雖然研究樣本暴力發生的年齡以年輕組佔大多數，但「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測量模式仍具有年齡的恆等性。研究者進一步採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年齡組的差異發現，「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四個構面與精神暴力總分，皆無明顯的年齡差異。

## (五) ROC 曲線分析

為了更為理解分數高低的意義，研究者利用 ROC 曲線分析進行各構面切點分數的討論，並將各構面分為高低兩組，提供適切的評估，以了解自己是否落於精神暴力的風險。最後，依各構面高低組，進行效標間的差異檢定。

### 1. 準確度與最佳切分點的判定

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受訪者修正 CTS 量表精神虐待判定輕度有 76 人，中重度有 104 人。研究者採 Fawcett(2006)及 Hanley 與 McNeil(1982)的建議，以 ROC 曲線下面積 AUC 大小與 Youden 指數作為判定的標準。根據表 5 顯示，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各分構面

的 AUC 分別為 .814、.770、.856、.819，皆大於 .70，精神暴力自我評估的總分 AUC 為 .911，表示本量表有良好的鑑別力，可以自我評估的方式作為精神暴力預測性指標，且具有良好的篩檢力。

然而，好的檢驗工具必須同時具備敏感度 (sensitivity) 與特異度 (specificity)。敏感度表示可以正確篩檢出中重度精神暴力的機率；特異度表示可以正確篩檢出沒有中重度精神暴力的機率。準確度為 (accuracy) 代表正確篩檢出有中重度精神暴力和沒有中重度精神暴力的機率。而 Youden 指數又稱為正確指數，計算 1 減去特異度與敏感度離對角線垂直距離最大的點，最大值兼具了敏感度與特異度，可視為最佳切點。因此，研究者利用 Youden 指數最大值，同時保持敏感度和特異性均高 .50，來反映真實性與四個構面的最佳切點。根據表 6 顯示，「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各分構面的 Youden 指數在 .401 – .592 之間，精神暴力自我評估的總分 Youden 指數為 .692，且準確度都在 .70 以上。

表 6 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 ROC 曲線分析

	AUC	<i>p</i>	敏感度	特異度	準確度	Youden	最佳切點
語言貶抑	.814	***	.712	.842	.767	.554	5.500
攻擊威脅	.770	***	.769	.632	.711	.401	3.500
控制隔離	.856	***	.644	.947	.772	.592	12.500
情緒威脅	.819	***	.750	.711	.733	.461	6.500
精神暴力	.911	***	.837	.855	.844	.692	24.500

註：\*\*\*表示 $p < .001$ 。

## 2. 自我評估結果的分類

根據各構面與總分 Youden 指數最佳切點標準，如表 6 所示，研究者以得分高於最佳切點為「高風險」，低於最佳切點為「低風險」。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高風險」與「低風險」兩組，在「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情緒威脅」及「總分」得分上的差異，結果發現如表 7 所示，「高風險」組在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各構面與總分均高於「低風險」組，兩者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表示各構面與總分的切點分數，區分出「高風險」與「低風險」確實可以反映精神暴力嚴重程度的高低。

表 7 切點分數在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各構面的差異性檢定

切點	語言貶抑		攻擊威脅		控制隔離		情緒威脅		總分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i>N</i>	86	94	108	72	71	109	100	80	98	82
<i>M</i>	8.105	1.989	7.093	1.708	18.394	5.798	9.020	3.825	37.796	14.817
<i>SD</i>	1.940	1.707	2.326	1.131	3.450	3.856	1.524	1.727	8.600	5.825
<i>T</i>	22.490	***	20.665	***	22.315	***	21.416	***	21.258	***

註：\*\*\* 表示  $p < .001$

為了進一步檢視四個構面及總分的切點分數所區分出「高風險」與「低風險」，兩組在外部效標「危險程度自我評估」是否有差異。本研究採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8 所示，確實各構面與「總分」的「高風險」組自我評估這段關係的危險程度比「低風險」組更高，且在統計上達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可以看出本研究不同構面切點分數區分「高風險」與「低風險」兩組，確實可以幫助當事人自我辨識與評估精神暴力的危險程度。

表 8 切點分數在外部效標的差異性檢定

切點	語言貶抑		攻擊威脅		控制隔離		情緒威脅		總分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i>M</i>	7.767	6.894	7.843	6.514	7.972	6.881	7.870	6.613	7.949	6.549
<i>SD</i>	1.569	1.931	1.572	1.876	1.242	1.999	1.376	2.053	1.311	2.038
<i>T</i>	3.313	**	5.138	***	4.516	***	4.699	***	5.363	***

註：\*\*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 四、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編制具有本土化內涵、匿名性高、多維度且具有信效度的精神暴力自我評估工具。根據四階段研究結果，確認「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助人工作者評估與當事人自我評估的構面具有一致性，可分為「語言貶抑」、「攻擊

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四個構面，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四個構面與外在效標皆呈現顯著相關，表示該量表具有效標關聯效度，且符合性別與年齡恆等性檢定。為了在實務上，提供社區樣本明確且簡易計分與切點分類，本研究採 ROC 曲線分析，驗證本量表具有良好的篩檢力；同時，透過 Youden 指數最佳切點標準提供適切的評估，切點分數在四個構面與外部效標有顯著差異，可區辨精神暴力風險的高低，幫助當事人在「家醜不可外揚」與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欲保全個人面子與家族和諧，而不願或尚未通報現身之際，仍有自評工具辨識自身精神暴力的危險程度。

根據研究發現，研究者歸納整理出幾點研究貢獻，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 (一)「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具有多維度的內涵

WHO(2021) 將侮辱、貶低、羞辱、恐嚇與傷害威脅均劃入精神暴力中心理暴力 / 情緒虐待的範疇，而 NISVS 將威脅與控制視為高壓管控的範疇 (Smith, et al., 2017)，可以看出國際間雖然基本上同意精神暴力多樣化的內涵，但沒有統一的歸類方式與定義 (Follingstad, 2007)。然而，本研究結果不同於 WHO 與 NISVS 分類方式，研究者認為語言貶抑偏向透過語言的羞辱使當事人自我形象扭曲，產生無價值感與自我懷疑，常被稱為「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故將語言暴力聚焦於以語言侮辱、貶低與羞辱對方，在概念上宜與攻擊威脅區分開來。至於攻擊威脅主要透過語言或非語言的威脅恐嚇，使當事人心生畏懼，雖非直接採行為控制的方式，限制、監視、孤立對方，但仍達到高壓管控的支配目的。是故，研究者認為羞辱當事人的「語言貶抑」與「攻擊威脅」使之心生畏懼或「控制隔離」實屬精神暴力的不同構面。

至於「情緒威脅」作為隱性的心理控制，不易被發現，且易與其他的暴力形式相連結。相對人透過語言與非語言的方式操弄當事人的緊張、害怕、恐懼、自責、內疚等複雜的情緒，如揚言自殺、要死就一起死…等，使得當事人欲追求個人面子與家族和諧的同時，亦擔心相對人採取報復行動，甚至相信自己可能會被殺害 (林明傑、吳啟安，2018；姚淑文，2017)，屬精神暴力的不同構面。

## (二)「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具性別與年齡恆等性

過去 IPV 自評工具多以女性為受虐主體 (McHugh et al., 2013)，強調 IPV 是父權壓迫女性的表現，常見的自評工具 CTS2 亦被視為工具本身存有性別的偏見，可能影響評估工具的中立性 (Wareham et al., 2022)。而本研究開發的自評工具「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通過性別恆等性統計檢定，一方面顧慮精神暴力多維度的內涵，另一方面兼具信效度與性別與年齡恆等性，適用於不同性別與年齡的當事人進行自我評估，在社區樣本自我評估上優於 CTS2。而獨立樣本 *t* 檢定進一步顯示，精神暴力「語言貶抑」、「攻擊威脅」、「控制隔離」及「情緒威脅」四個構面，在統計上無性別與年齡的顯著差異。

## (三)「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可區辨風險高低

由於精神暴力的隱蔽性極高，不易被察覺，有時當事人還會合理化相對人的暴力行為 (戴世玫, 2016)。本研究利用 ROC 曲線分析，驗證「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具有良好的篩檢力，透過 Youden 指數最佳切點標準提供適切的評估，提供疑似或遭受精神暴力的當事人，在匿名的處境下，保全個人與家族面子，可自我辨識與評估精神暴力的危險程度，進而評估是否進一步尋求專業助人工作者的協助。

##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礙於社區樣本 IPV 倖存者邀請不易，本研究僅以受訪對象的生理性別為區分 (以女性 IPV 倖存者為多數)，未進行性傾向的討論，且沒有納入 65 歲以上高齡者，為本研究限制。在邀請工作上，研究者發現社區樣本男性 IPV 倖存者找尋不易，可能因為精神暴力的隱蔽性高，礙於面子問題與其伴隨而來的社會污名，難以對外訴說；也可能如 Douglas 與 Hines(2011) 所說的，男性求助負向經驗是正向經驗的兩倍，故在邀請與訊息的揭露上有所疑慮。對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可以本研究為基礎，(1) 增加樣本數，考慮以配額抽樣來平衡性別與年齡比例；(2) 與相關單位合作，增加通報樣本調查，進一步與社區樣本進行比較；(3) 與男性關懷專線合作，特別針對男性 IPV 倖存者進行調查；(4) 拓展樣本多樣性，延伸討論華人家族



主義下性少數 IPV 與老人虐待的現象。

其次，精神暴力的內涵包含積極主動與消極被動二層面，本研究較偏向積極性精神暴力，相關討論未涵蓋消極性精神暴力（例如：採取漠不關心、拒絕溝通、視而不見等被動消極回應的方式，達到支配與操弄對方情緒之目的），為本研究應用限制。對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優化精神暴力自我評估量表，增加 IPV 冷暴力與被動式攻擊的評估與討論，以及互動情境設計，有助於當事人辨識自己所處的暴力情境。

此外，Follingstad(2007) 強調精神暴力無論是在解釋、意圖、背景脈絡的評估都充滿了複雜性與變異性。對此，研究者建議在未來研究與實務上，進行 IPV 評估時，持續進一步關注於精神暴力的多樣性，檢視暴力樣貌是否隨著社會變遷而有不同，且長期追蹤不同形式的精神暴力對當事人身心健康與伴侶關係的影響。

## 謝 誌

本研究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線上檢測計畫的一部分。特別感謝審查人與編委會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以及協助和參與調查的每一位朋友，在此謹表謝意。

## 參考文獻

- 王珮玲 (2009)。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實務操作方法的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1)，141-184。 <https://doi.org/10.6785/SPSW.200906.0141>
- 王珮玲 (2012)。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TIPVDA) 之建構與驗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6**(1)，1-58。 <https://doi.org/10.6785/SPSW.201206.0001>
- 王珮玲 (2015)。如影隨形的暴力：親密伴侶跟蹤行為。**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9**(1)，1-44。 [https://doi.org/10.6785/SPSW.201506\\_19\(1\).0001](https://doi.org/10.6785/SPSW.201506_19(1).0001)
- 王麗容、陳芬苓、王雲東 (2012)。我國性別暴力現況調查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成果報告，計畫編號：PG10007-0094。

- 沈瓊桃(2013)。大專青年的約會暴力經驗與因應策略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6**(1)，1-31。[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303\\_26\(1\).0001](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303_26(1).0001)
- 沈瓊桃、趙雨龍、高建秀(2019)兩岸三地青少年約會暴力盛行率及其與憂鬱情緒關係之探討。**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8**(3)，280-288。[https://doi.org/10.6288/TJPH.201906\\_38\(3\).108011](https://doi.org/10.6288/TJPH.201906_38(3).108011)
- 林明傑、吳啟安(2018)。高致命危險案件之快速篩檢指標與分類研究。**犯罪學期刊**，**20**(2)，53-76。
- 林明傑、簡蕾如、史玉山(2003)。**婚姻暴力加害人再犯危險評估與致命危險評估量表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成果報告，計畫編號：092-000000AU701-004。
- 姚淑文(2017)。**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實務處理手冊**。教育部。
- 黃芳銘(2003)。**結構方程模式：理論與應用**。五南。
- 潘淑滿、林東龍、林雅容、陳杏容(2015)。**103 年度「臺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統計資料調查」**。衛福部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M03C3422。
- 潘淑滿、林東龍、林雅容、劉一龍(2021)。**109 年度「臺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統計調查計畫」**。衛福部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M09C7266。
- 衛福部(2021 年 11 月 26 日)。**30 秒精神暴力自我檢測量表**。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 家定暴力防治 / 宣導專區 <https://dep.mohw.gov.tw/dops/cp-1158-64153-105.html>
- 戴世玫(2016)。臺灣婚姻暴力圖像：從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的觀點出發。**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0**(2)，43-82。[https://doi.org/10.6785/SPSW.201612\\_20\(2\).0002](https://doi.org/10.6785/SPSW.201612_20(2).0002)
- Bentler, P. M. (1990). Comparative fit indexes in structural mode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2), 238-246.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7.2.238>
- Campbell, J. C. (2002). Health consequ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e Lancet*, *359*(9314), 1331-1336.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2\)08336-8](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2)08336-8)
- Carney, M. M., & Barner, J. R. (2012). Prevalence of partner abuse: Rates of emotional abuse and control. *Partner Abuse*, *3*(3), 286-335. <https://doi.org/10.1891/1946-6560.3.3.286>

- Cheung, G. W., & Rensvold, R. B. (2002). Evaluating goodness-of-fit indexes for testi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9(2), 233-255. [https://doi.org/10.1207/S15328007SEM0902\\_5](https://doi.org/10.1207/S15328007SEM0902_5)
- Corbally, M. (2015). Accounting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biograph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strategies used by men experiencing IPV from their female partn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0(17), 3112-3132.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4554429>
- Dokkedahl, S. B., Kirubakaran, R., Bech-Hansen, D., Kristensen, T. R., & Elklit, A. (2022). The psychological subtyp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its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es. *Systematic Reviews*, 11(1), 1-16. <https://doi.org/10.1186/s13643-022-02025-z>
- Douglas, E. M., & Hines, D. A. (2011). The helpseeking experiences of men who susta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 overlooked pop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6(6), 473-485.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11-9382-4>
- Dutton, M. A., & Goodman, L. A. (2005). Coercion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oward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Sex Roles*, 52(11), 743-756.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05-4196-6>
- European Institute of Gender Equality (2017). Glossary of definitions of rape, femicid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eige.europa.eu/publications/glossary-definitions-rape-femicide-and-intimate-partner-violence>
-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14).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 EU-wide survey: Main results*. FRA,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 Fawcett, T.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ROC analysi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27(8), 861-874. <https://doi.org/10.1016/j.patrec.2005.10.010>
- Follingstad, D. R. (2007). Rethinking current approaches to psychological abus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2(4), 439-458. <https://doi.org/10.1016/j.avb.2006.07.004>

- Follingstad, D. R., Coyne, S., & Gambone, L. (2005). A representative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and its severity. *Violence and Victims*, 20(1), 25-38. <https://doi.org/10.1891/vivi.2005.20.1.25>
- Frieze, I. H. (2005). Female violence against intimate partners: An introductio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9(3), 229-237.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2005.00217.x>.
-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200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7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 Hamberger, L. K. (2005). Men's and women's us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linical samples: Toward a gender-sensitive analysis. *Violence and Victims*, 20(2), 131-152.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2005.20.2.131>
- Hanley, J. A., & McNeil, B. J. (1982). The meaning and use of the area under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Radiology*, 143(1), 29-36. <https://doi.org/10.1148/radiology.143.1.7063747>
- Heise, L., Pallitto, C., García-Moreno, C., & Clark, C. J. (2019). Measuring psychological abuse by intimate partners: Constructing a cross-cultural indicator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SM-Population Health*, 9, 100377. <https://doi.org/10.1016/j.ssmph.2019.100377>
- Jacobson, N. S., & Gottman, J. M. (1998). *When men batter women: New insights into ending abusive relationships*. Simon and Schuster.
- Johnson, M. P. (2008). *A typology of domestic violence: Intimate terrorism, violence resistance, and 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Karakurt, G., & Silver, K. E. (2013). Emotional abus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gender and age. *Violence and Victims*, 28(5), 804-821.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VV-D-12-00041>
- Martín-Fernández, M., Gracia, E., & Lila, M. (2019). Psychologic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cross-national invariance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9(1), 1-11.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9-7998-0>

- MacCallum, R. C., & Hong, S. (1997). Power analysi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 using GFI and AGFI.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2, 193-210.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06mbr3202\\_5](https://doi.org/10.1207/s15327906mbr3202_5)
- McHugh, M. C., Rakowski, S., & Swiderski, C. (2013). Men's experience of psychological abus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issues. *Sex Roles: A Journal of Research*, 69(3), 168-181.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13-0274-3>
- Murphy, C. M., & Hoover, S. A. (1999). Measuring emotional abuse in dating relationships as a multifactorial construct. *Violence and Victims*, 14(1), 39-53.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14.1.39>
- Rice, M. E., & Harris, G. T. (1995). Violent recidivism: Assessing predictive validit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3(5), 737.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63.5.737>
- Schumacker, R. E., & Lomax, R. G. (2004). *A beginner's guide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sychology Press.
- Shepard, M. F., & Campbell, J. A. (1992). The Abusive Behavior Inventory: A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bus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7(3), 291-305.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92007003001>
- Smith, S. G., Chen, J., Basile, K. C., Gilbert, L. K., Merrick, M. T., Patel, N., Walling, M., & Jain, A. (2017). *The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NISVS): 2010-2012 State Report*. Atlanta, GA: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Stark, E. (2007). *Coercive control: How men entrap women in personal life*. Oxford U. Press.
- Stark, E. (2013). The dangers of dangerousness assessment. *Family &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Quarterly*, 6(2), 13-22.
- Straus, M. A., Hamby, S. L., Boney-McCoy, S. U. E., & Sugarman, D. B. (1996). The 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CTS2)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dat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7(3), 283-316.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96017003001>



- Tolman, R. M. (1999). The valid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of Women Inventory. *Violence and Victims*, 14(1), 25-37.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14.1.25>
- Walker, L. E. (1979). *The battered woman*. Harper & Row.
- Wareham, J., Wagers, S. M., Rodriguez, L. M., & Neighbors, C. (2022). An exploration of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sex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Victims & Offenders*, 17(2), 161-181. <https://doi.org/10.1080/15564886.2021.193421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March 9).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evalence estimates, 2018: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prevalence estimate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lobal and regional prevalence estimates for non-partner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ublications /Overview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22256](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tem/9789240022256)

#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Self-Assessment Scale in Taiwan

HSIU-YUN TSENG, HAO-WEI WANG

**Purpos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human rights and mental health. We developed th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self-assessment scale to provide victims with a reliable and valid anonymous tool to help them assess their level of risk for psychological violence. **Methods:** We developed the scale in 4 stages. In the first 3 stages, different groups of social workers,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clinical psychologists, teachers, and medical staff completed a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ssessment to confirm the items to be included on the scale. In the fourth stage, 180 victims (37 males, mean age 38.56; 143 females, mean age 35.79)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We used CFA to verify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multi-group analysis and ROC curve analysis to test gender invariance and screening ability. **Results:** We identified 4 reliable and valid dimensions for the scale with good fit: derogatory speech, intimidation, forced isolation, and emotional threats.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d gender invariance and verified that the scale has good screening ability and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assessment. **Conclusion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risk as measured by the new tool indicates the level of severity of psychological violence that the victim has experienced. This tool can help individuals to recognize their level of risk.

**Key words:** coercive contro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psychological/emotional abuse

---

Hsiu-Yun Ts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ih Chie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helly.tw@gmail.com)

Hao-Wei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amily Studies and Child Development, Shih Chien University.